

农户生计资本异质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

——以江汉平原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为例

陈银蓉¹ 张蓓¹ 朱庆莹²¹

(1. 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2. 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 研究农户生计资本异质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对促进农地流转、优化农地流转绩效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 1017 户农户家庭为实证, 在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评价的基础上, 采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异质对流转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 江汉平原地区的农户社会资本水平较低, 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水平较高; 农户的金融资本不影响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 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鄂西圈农户的农地质量、承包地面积、固定资产种类数、家庭劳动力占比、非农劳动力人数、家庭年人情支出对农地转入或转出有正向影响, 农地灌溉条件和家庭劳动力最高学历对该地农地转入或转出有负向影响, 江汉平原地区农户的承包地面积、固定资产种类数、家庭牲畜种类数和家庭年人情支出对农地转入或转出均有正向影响。因此, 两区域都应做好农地保护工作, 提高农户自然资本水平, 提高劳动力素质, 提升农户劳动力资本水平; 江汉平原应鼓励有条件的农户饲养一定数量牲畜, 加强金融支持; 鄂西圈应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交通便捷度, 提升村民社会资本, 大力发展地区经济, 提升农户的金融资本水平。

【关键词】: 生计资本 农地流转决策 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 江汉平原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227(2022)09-2073-13

农地流转是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的重要途径^[1]。在农业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的背景下, 小规模农业只有向产业化、集约化靠拢, 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才能提高, 农业经济发展才能有长足的进步。作为农地流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农户的生计资本决定了在土地利用中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2]。土地利用中行动策略的不同带来了不同的农地流转决策。因此, 研究农户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对于促进农地流转、优化农地流转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学者对农地交易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交易费用、经营规模、劳动力水平等角度展开: 例如, Bogaerts 等^[3]通过对部分农地交易案例的研究, 认为过高的交易费对农地流转交易具有不利影响; Van dijk^[4]认为农户家庭有效劳动力和拥有牲畜数量与规模经营决策的关系十分密切; Gorton^[5]发现可以通过联合经营的方式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国内学者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农地流转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从宏观角度来说, 丰雷等^[6]研究发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对农地流转的促进效应十分显著; 高佳等^[7]认为劳动力转移规模同样影响着农地流转, 且这种影响具有动态性和阶段性差异。从微观角度来说, 吴巍等

作者简介: 陈银蓉(1963~), 女,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管理. E-mail: cyr@mail.hzau.edu.cn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YJAZH015)

^[8]研究发现农户家庭承包地面积、劳动力人数、纯农劳动力占比、土地流转前工资性收入和种植业收入等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性因素；阳利永等^[9]研究发现农户分化程度显著影响着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农户是农地流转的主体之一，对自身生计资本禀赋的衡量决定了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不同^[10]。陈曼等^[11]研究发现政策、自然和心理三类资本对武汉城市圈农地流转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王雪琪等^[12]研究认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人力资本会促进农地转出抑制农地转入，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入转出均有促进作用。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目前农地流转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仅有少数学者分析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此外，现有研究未曾从空间异质的角度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难以充分解释区域异质造成的影响效应的不同。因此，本文以湖北省江汉平原、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以下简称“鄂西圈”)为例，基于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决策影响的理论分析，运用 1017 份实地调研数据，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从测定不同区域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出发，采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异质对流转决策的影响，为差异化地制订农地流转政策、推进农地流转和优化农地流转绩效提供依据。

1 理论分析

1.1 农地流转决策与生计资本的内涵

由于中国的现行法律禁止农地私人买卖，所以国内的农地流转是指农户与农户之间或者农户与集体之间对农地使用权的转让、转包和租赁等行为，包括农地使用权的转入和转出。根据实际调研情况，本文舍去样本数过少的既转入也转出农地的农户样本，将农地流转决策具体分为不流转农地、农地转入和农地转出 3 类，文章研究的是农户生计资本对这 3 类农地流转决策影响的异质性效应。

生计即维持生活的计策，是一种建立在能力、资产和活动上的谋生方式^[13]。1999 年英国国际发展署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提出了可持续生计框架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SLF)^[14]，该框架将生计定义为谋生所需要的个人能力、物质资产、社会资源及从事的活动的集合，且将生计资本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15] 将生计的概念扩展为人们赖以生存的手段、活动、权力和资产；对于生计资本的涵义，Scoones^[16] 认为生计资本是在特定背景下导向不同生计战略组合的生计资源组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将生计资本定义为社区和家庭的资源基础；李荣彬^[17] 认为生计资本是农户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的外在表现。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将农户生计资本定义为影响农户个人或家庭生存现状和发展前景的各类资源和能力的集合，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将其划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1.2 不同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

自然资本是农户维持家庭生计的自然资源禀赋，一般指的是拥有和使用农地的情况。具体包括农户家庭的农地质量和农地面积两个方面。农户的自然资本水平越高，越倾向于转入农地：从农地质量来说，质量越高的农地单位面积的生产效益也就越高，农户也就越倾向于转入农地扩大生产^[10]；从农地面积来说，规模经营的形成可以在较低的农业成本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18]，所以农户家庭土地经营面积越大，越倾向于转入农地从事规模经营^[19]。现有研究认为，耕地细碎化会阻碍农地规模经营，影响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相较平原和丘陵地区，山区的地形复杂，相对较高的耕地细碎化程度会导致大量农地撂荒，不利于农地流转^[20, 21]。

物质资本是指农户以维持生计为目的的基础生活设施和生产资料，是农业生产生活的基本前提条件，包括住房、饲养牲畜情况和耐用品等^[12]。一般来看，物质资本水平越高的农户在本地生活水平越高，流出农地的可能性越低。分析原因如下：一方面，农户饲养的牲畜越多，对农牧业的资本投入越多，越愿意转入农地扩大养殖规模增加收入^[10]；另一方面，拥有耐用品较多的农户家庭生活比较舒适，劳动力会更愿意留在本地打工或者务农，并且打工的部分农户考虑到非农工作的不稳定性，仍会继续种植农地，所以农户不流转或者转入农地的概率比较大^[22]；此外，农业机械价值越高的农户家庭越不愿意转出农地，因为如今的农户一

般会雇佣同村的村民翻地、播种和收割等，拥有农机械的家庭在种植农地的同时还可以获得租金收入，转出农地的意愿较低^[23]。

人力资本指的是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身体健康状况、个人能力、知识水平和技能掌握情况，决定了农户驾驭其他资本的能力和范围^[24]。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户家庭倾向于转出或转入农地，但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对农地转入或转出决策的具体影响不同：在现有的农业条件下，农业技能培训可以让农户在同样的土地上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从而提高农户转入农地增加农业收入的积极性；而文化程度较高的优质劳动力更易于接受土地流转政策和市场形式，更有能力和机会外出从事非农经营活动，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较小，倾向于转出农地^[10,25]。和山区相比，平原地区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户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等普遍较高，且由于交通方便等的优势更易于转出农地^[26]。

金融资本指为了个体在追求生计目标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包括年收入、存款、贷款金额等。金融资本对农地转出决策有正向影响。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地流转状况有明显不同，这是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地区，富裕家庭的农户比较多，农户基于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目标会更愿意转出农地从事回报更高的非农产业，实现非农收入的最大化^[10,27]。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为了达到生计目标所利用的社会资源，常见的有人情开支、对亲朋的信任度等。社会资本在农地流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一般来看，社会资本丰富的农户得到了较多人的信任，社会网络降低了农业交易成本，促进了农地的转入和转出^[22,28,29]；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农户家庭人情支出占比越高，转入农地的面积越大^[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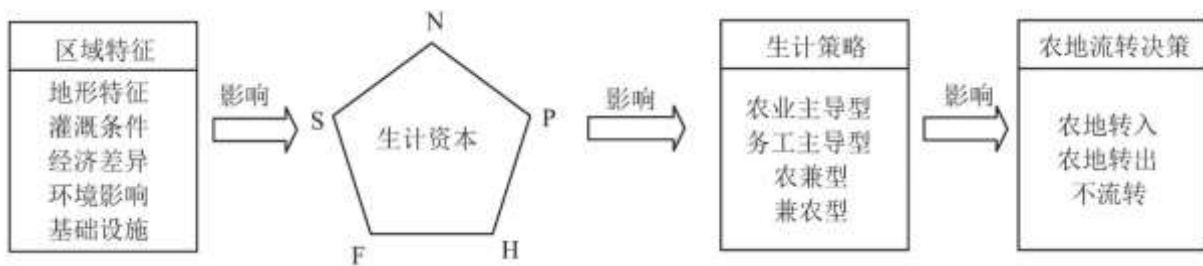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注：N:自然资本；P:物质资本；F:金融资本；H:人力资本；S:社会资本。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2.1.1 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概况

为比较不同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户生计资本差异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本研究选取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的天门市、孝感市、武汉市和鄂西圈的荆门市、荆州市、宜昌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作为研究区域。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以平原地形为主，平均海拔仅 27m 左右，面积 4.6 万余 km²，除了区域内大大小小的 300 多个湖泊，亚热带季风性气候也带来了丰沛的降水，充足的水资源和肥沃的土壤为各项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该平原主要以种植水稻、棉花、油菜为主，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基地之一。截至 2019 年，江汉平原地区的天门市、孝感市和武汉市共有常住人口 1738.04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29.32%；区域 GDP 为 19175.43 亿元，占全省总 GDP 的 41.8%，由此可见，江汉平原对湖北省经济发展至关重要。2008 年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指示开展了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规划工作，鄂西圈的概念由此诞生。鄂西圈地处湖北省西部，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区域面积 12.7 万余 km²，占全省总面积的 68.77%。鄂西山区地形复杂，海拔高差悬殊，气候复杂多样，

自然灾害频发,耕地质量差且水土流失问题严重,农业生产条件较差。截至2019年,鄂西圈的荆门市、荆州市、宜昌市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共有常住人口1599.5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6.98%;区域GDP为10170.44亿元,占全省总GDP的22.19%,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且极不均衡。因此,江汉平原地区和鄂西圈代表着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类地区,选择这两个研究区域开展农户生计资本异质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对湖北省乃至全国其他地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1.2 区域农户生计资本概况

根据实地调研和相关调研数据,本文发现江汉平原和鄂西圈农户在自然、物质、人力、金融、社会资本情况等情况方面也具有一定差异。在自然资本方面,江汉平原地区农户家庭承包地面积最大值为13.33hm²,最小值为0.067hm²,均值为0.49hm²。鄂西圈的农户家庭承包地面积的最大仅有1.53hm²,平均面积为0.44hm²,比江汉平原地区的农户家庭承包地面积均值低11%,说明鄂西圈的农户家庭承包地面积较小。且在调研中发现,鄂西圈地区农地细碎化程度高,农户普遍对农地质量、灌溉条件不太满意;在物质资本方面,江汉平原地区农户住宅相对更集中且规划地更好,鄂西圈地区村庄距离县城相对较远,且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太发达,如由鄂西圈青堡村农户出村要翻过两个山头,开车到县城需要两个小时之久;在人力资本方面,两区域的受访者在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身份和健康状况上分布差异不大。受访农户中老年农户占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且以普通群众最多,就受访者的健康状况而言,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身体健康,大多有能力从事家庭农业生产;在金融资本方面,江汉平原地区农户金融资本状况整体高于鄂西圈地区,体现在江汉平原地区农户家庭收入和存款均较高,考虑为江汉平原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个人农户家庭的影响;在社会资本方面,实地调研中发现鄂西圈留村的老人更多,且相互间联系更加紧密,相反江汉平原地区虽农户家庭距离很近,但对邻里之间的了解程度相对较低。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的数据来源于“生计资本视角下农地流转行为决策机理、绩效评估与改进研究”课题的调查问卷。课题组于2020年12月和2021年3月对湖北省江汉平原地区的天门市、孝感市、武汉市和鄂西圈的荆门市、荆州市、宜昌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55个村庄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以问卷调查和一对一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体调查农户的生计资本和农地流转等相关信息,共发放回收1021份问卷(表1),整理后得到有效问卷1017份,问卷有效率99.6%。

表1 问卷调查地点说明

区域	市	县区	乡镇	村	问卷数(份)
鄂西圈	荆州市	公安县	毛家港镇	前岗村、沙班桥村、曹咀村、后岗村、塘咀村	79
			麻豪口镇	沙场村、荆华村、荆丰村、荆湖村、麻口村	65
			斗湖堤镇	荷花淀村	9
	荆门市	沙洋县	官垱镇	双冢村、马坪村、王坪村、斋巷村、鄂冢村、曾巷村、张庙村	65
			曾集镇	曾巷村	7
			李市镇	黄岭村	47
			高阳镇	官桥村、高阳村、坵冢村、杨集村、吴集村	55
	恩施州	恩施市	龙凤镇	杉木坝村、二坡村、青堡村	182

	宜昌市	夷陵区	龙泉镇	香烟寺村、雷家畝村、法官泉村	91
			鸦鹊岭镇	东山村、龙潭村、三合村	91
江汉平原地区	武汉市	江夏区	金口街道	白马头村、白衣庵村	43
		蔡甸区	永安街道	火焰村、金龙村	18
	天门市	天门市	岳口镇	荷花潭村、刘家湾村、截河村、肖马湾村、涂杨村、东岳庙村、新丰村、谭台村	100
			卢市镇	魏场村、兵铁村、大桥村	40
			彭市镇	胡家咀村	40
	孝感市	应城县	田店镇	畅马村	36
			陈河镇	彭万村、王郑村、柯邓村、张场村	44

受访农户男性占 62.0%，女性占 38.0%；学历以未上过学和小学的农户为主，分别占比 29.4%和 41.8%，大学(高专)及以上的农户仅占 0.8%。样本的地区分布中，江汉平原原有 329 个，鄂西圈有 688 个；调研选取地形以平原和丘陵为主，分别占比 42.4%和 39.2%。

2.3 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综合相关理论分析，参考已有研究并结合研究区域具体情况，本文选择 15 个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来衡量农户生计资本，拟采用熵值法确定所选指标的客观权重大小(表 3)。具体指标选择如下：(1)考虑到江汉平原淡水湖密布、土地肥沃，两地区的农地质量和农地灌溉条件相差较大，故选择农户家庭的农地质量和农地灌溉条件反映自然资本质量的优劣，选择农户家庭承包地面积反映自然资本存量的丰裕程度。(2)鄂西地区由于地形原因，农户出行主要依靠个人家庭所有的交通工具，这也是近年来经济大发展环境下农户固定资产在平原和山区间的主要差距，故选择农户家庭固定资产种类数、饲养牲畜数量和住房类型来衡量农户的物质资本情况。固定资产和饲养牲畜数量越多，住房类型越好，物质资本越丰裕。(3)由于研究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悬殊，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相差较大，农户接受教育和非农培训的机会和水平不同，故选择劳动力占比、非农劳动力人数反映农户家庭拥有劳动力的数量和类别情况，选择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反映劳动力拥有的知识水平。(4)选择农户家庭年收入表征金融资本流量和存量的丰裕度，选择获得信贷难易程度表征农户资金可获得性的大小。(5)根据研究区域的具体情况，本文选择对亲朋邻里的信任度和年人情支出表征社会资本中社会网络的广度和深度，选择农户家庭有无政府机关工作来表征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参与。

表 2 样本的基本特征

特征	类别	频数	比例(%)
性别	女	386	38.0
	男	631	62.0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299	29.4

	小学	425	41.8
	初中	203	20.0
	高中(中专)	82	8.1
	大学(高专)及以上	8	0.8
地形	平原	431	42.4
	山地	187	18.4
	丘陵	399	39.2
区域	江汉平原地区	329	32.4
	鄂西圈	688	67.6

表 3 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权重及指标内涵

类型	指标	符号	权重	赋值
自然资本 (N)	农地质量	N1	0.008	很差=1, 比较差=2, 一般=3, 比较好=4, 非常好=5
	承包地面积	N2	0.038	单位: 亩
	灌溉条件	N3	0.018	很差=1, 比较差=2, 一般=3, 比较好=4, 非常好=5
物质资本 (P)	固定资产种类数	P1	0.012	农户家庭拥有洗衣机、电脑、冰箱、电视机、空调、三轮车、摩托车、小汽车等固定资产的种类数量, 单位: 种
	饲养畜禽数量	P2	0.068	农户家庭拥有鸡、鸭、鹅、猪、羊、牛等牲畜折算后的数量, 0LU=1, 0~1LU=2, >1LU=3
	住房类型	P3	0.014	简易结构=1, 砖木结构=2, 混凝土结构=3
人力资本 (H)	劳动力占比	H1	0.028	劳动力占比=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总人口数
	非农劳动力人数	H2	0.066	单位: 人
	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	H3	0.029	未上过学=1, 小学=2, 初中=3, 高中(中专)=4, 大学(高专)及以上=5
金融资本 (F)	年收入	F1	0.064	单位: 元
	总存款	F2	0.078	单位: 元
	获得信贷难易程度	F3	0.052	非常困难=1, 比较困难=2, 一般=3, 比较容易=4, 非常容易=5
社会资本	对亲朋邻里的信任	S1	0.008	全部不可信任=1, 少数可信任=2, 一半可信任=3, 大多数可信任=4, 全部可信任

(S)	度			=5
	有无政府机关工作	S2	0.469	有=1, 无=0
	年人情支出	S3	0.038	单位: 元

注: LU表示畜禽单位(Livestock Units). 1头牛=1LU, 1头猪=0.25LU, 1只羊=0.2LU, 1只家禽(鸡、鸭、鹅)=0.005LU^[32].

2.4 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测算模型

(1) 指标标准化处理

首先, 采用 Min-max 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标准化:

$$X_{ij} = \frac{a_{ij} - \min\{a_{ij}\}}{\max\{a_{ij}\} - \min\{a_{ij}\}} \quad (i = 1, 2, \dots, m, j = 1, 2, \dots, n) \quad (1)$$

负向指标标准化:

$$X_{ij} = \frac{\max\{a_{ij}\} - a_{ij}}{\max\{a_{ij}\} - \min\{a_{ij}\}} \quad (i = 1, 2, \dots, m, j = 1, 2, \dots, n) \quad (2)$$

式中: a_{ij} 为第 i 个样本中第 j 项指标值; X_{ij} 为标准化后的值; $\max\{a_{ij}\}$ 是第 j 项指标中的最大值; $\min\{a_{ij}\}$ 是第 j 项指标中的最小值。

(2) 指标权重的赋值

采用熵值法确定所选指标的客观权重大小, 计算公式如下:

计算第 i 个指标在第 j 项指标下所占的比重:

$$P_{ij} = \frac{X_{ij}}{\sum_{i=1}^m X_{ij}} \quad (i = 1, 2, \dots, m, j = 1, 2, \dots, n) \quad (3)$$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

$$e_j = -\frac{1}{\ln m} \sum_{i=1}^m P_{ij} \ln P_{ij}, \quad e_j \in [0, 1] \quad (4)$$

计算差异系数:

$$g_j = 1 - e_j \quad (5)$$

计算指标权重:

$$W_j = \frac{g_j}{\sum_{j=1}^n g_j} \quad (6)$$

(3) 生计资本水平值的计算

采用加权平均模型计算五个维度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值, 计算公式如下:

$$S_j = \sum_{i=1}^m W_j a_{ij} \quad (i = 1, 2, \dots, m, j = 1, 2, \dots, n) \quad (7)$$

$$h_j = \frac{S_j}{m} \quad (8)$$

式中: a_{ij} 为第 i 个样本中第 j 项指标值; W_j 为熵值法求得的第 j 项指标值的权重; S_j 是计算得到的五维生计资本值; h_j 是五维生计资本值的平均值。

2.5 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

根据理论框架, 分析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决策影响效应的异质性, 分别将不流转、转入农地和转出农地 3 种农地流转决策设为被解释变量 Y, 其中“1=不流转”“2=转入农地”“3=转出农地”, 将农户的生计资本 15 项评价指标作为自变量(X)。由于被解释变量为无序多分类变量, 故拟采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分析之前, 首先对选定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 发现各个自变量的 VIF 均小于 3, 满足小于 10 的临界要求, 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具有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然后对模型进行似然比检验, 得到 $P < 0.001$, 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性影响, 模型拟合度较好, 本研究问题适合采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方法。建立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如下:

$$\text{Logit } P_2 = \ln \frac{P\left(y = \frac{2}{x}\right)}{P\left(y = \frac{1}{x}\right)} = \beta_0^2 + \sum_{i=1}^k \beta_i^2 x_i \quad (9)$$

$$\text{Logit } P_3 = \ln \frac{P\left(y = \frac{3}{x}\right)}{P\left(y = \frac{1}{x}\right)} = \beta_0^3 + \sum_{i=1}^k \beta_i^3 x_i \quad (10)$$

式中：P(y=1/x)、P(y=2/x)和P(y=3/x)分别意为农户选择不流转、转入农地和转出农地的估计概率；LogitP₂表示农户选择转入土地相对于选择不流转的发生比；LogitP₃表示农户选择转出农地相对于选择不流转的发生比；y表示农地流转决策选择；(i=1, 2, 3, 4, …, k), k为正整数；β₀²和β₀³表示回归方程的常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生计资本与农地流转决策分析

基于上文的生计资本水平测算过程，计算出五个维度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值，具体计算结果见表4。由表4的计算结果可知，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具有一定的地区差异，江汉平原地区的农户社会资本水平低于鄂西圈，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水平均高于鄂西圈。原因分析如下：社会资本高的家庭，获得农地流转和外出就业的信息较容易，鄂西圈的农户相对来说和外界联系不太紧密，更依赖于邻里亲朋之间的信息交换，比较愿意经营邻里之间的关系，所以社会资本水平较高；江汉平原地区土壤肥沃、耕地灌溉条件优越且农地细碎化程度较低，此外，该地区经济发达、富裕家庭的农户较多，且教育资源丰富、农户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有更多农业或非农技术培训机会，故自然、物质、人力和金融资本水平也均较高。

表4 不同区域农户平均生计资本值

生计资本	江汉平原地区	鄂西圈
自然资本	0.020	0.018
物质资本	0.042	0.040
人力资本	0.056	0.055
金融资本	0.036	0.033
社会资本	0.037	0.050

表5 不同区域农地流转决策分布差异

农地流转决策	江汉平原地区	鄂西圈
--------	--------	-----

转入农地	14.3%	12.9%
转出农地	44.4%	51.7%
不流转农地	41.3%	35.3%

3.2 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效应分析

在选取农户生计资本的评价指标和建立计量模型的基础上，运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分别对鄂西圈和江汉平原地区的调研数据进行多项 Logistic 回归(表 6)。

表 6 多项 Logistic 回归结果

类型	变量	鄂西圈				江汉平原地区			
		农地转入		农地转出		农地转入		农地转出	
		B	EXP(B)	B	EXP(B)	B	EXP(B)	B	EXP(B)
自然资本(N)	N ₁ =1	15.541	5.615E+06	34.293	7.824E+14	-19.736	0.001	-16.547	0.001
	N ₁ =2	-1.858**	0.156	-0.198	0.820	-1.692	0.184	-0.358	0.700
	N ₁ =3	-0.988*	0.372	-0.085	0.919	-0.360	0.698	0.393	1.481
	N ₁ =4	-0.350	0.704	0.003	1.003	-0.082	0.922	0.411	1.508
	N ₁ =5(参照组)	0 ^b		0 ^b		0 ^b		0 ^b	
	N ₂	-0.057	0.944	0.079***	1.083	0.052	1.053	0.084*	1.087
	N ₃ =1	-0.570	0.569	-0.400	0.662	1.634	5.079	0.056	1.058
	N ₃ =2	1.186*	3.274	-0.125	0.883	0.085	1.089	-0.247	0.781
	N ₃ =3	0.159	1.161	-0.396	0.671	0.744	2.100	-0.204	0.820
	N ₃ =4	0.271	1.312	-0.015	0.989	-0.545	0.583	-0.290	0.751
N ₃ =5(参照组)	0 ^b		0 ^b		0 ^b		0 ^b		
物质资本(P)	P ₁	0.313***	1.364	0.149*	1.160	0.379**	1.462	0.118	1.119
	P ₂	-0.215	0.766	-0.691***	0.528	1.052**	2.871	-0.334	0.716
	P ₃ =1	-0.874	0.417	-1.828***	0.161	-15.764	0.001	-17.305	0.001
	P ₃ =2	-0.879***	0.415	-0.778***	0.459	-0.421	0.656	-0.685*	0.504
	P ₃ =3(参照组)	0 ^b		0 ^b		0 ^b		0 ^b	

人力资本 (H)	H ₁	0.387	1.473	-0.457	0.633	1.804*	6.075	-0.259	0.772
	H ₂	-0.262*	0.770	0.313***	1.367	-0.312	0.732	0.153	1.165
	H ₃ =1	0.370	1.448	0.421	1.524	0.923	2.516	1.680*	5.363
	H ₃ =2	-0.220	0.802	0.798**	2.221	1.521	4.578	0.952	2.592
	H ₃ =3	0.217	1.242	0.081	1.085	1.690*	5.419	0.645	1.906
	H ₃ =4	0.518	1.679	-0.028	0.972	0.848	2.336	0.364	1.439
	H ₃ =5 (参照组)	0 ^b		0 ^b		0 ^b		0 ^b	
金融资本 (F)	F ₁	-0.001	1.000	0.001	1.000	0.001**	1.000	0.001*	1.000
	F ₂	0.001***	1.000	0.001***	1.000	0.001	1.000	0.001	1.000
	F ₃ =1	0.482	1.620	0.748	2.113	0.833	2.300	1.137	3.118
	F ₃ =2	-0.089	0.915	0.691	1.997	-0.480	0.619	0.505	1.657
	F ₃ =3	0.469	1.598	0.585	1.795	0.514	1.673	1.025	2.786
	F ₃ =4	0.746	2.109	0.207	1.229	-0.468	0.626	0.613	1.846
	F ₃ =5 (参照组)	0 ^b		0 ^b		0 ^b		0 ^b	
社会资本 (S)	S ₁ =2	-18.643	0.001	-19.457	0.001	0.372	1.445	0.928	2.535
	S ₁ =3	-1.479	0.229	-0.783*	0.456	-17.500	0.001	-0.565	0.570
	S ₁ =4	-0.048	0.953	0.127	1.135	-0.003	0.997	-0.207	0.813
	S ₁ =5 (参照组)	0 ^b		0 ^b		0 ^b		0 ^b	
	S ₂ =0	-1.271***	0.270	0.042	1.043	-1.230	0.291	-0.531	0.589
	S ₂ =1 (参照组)	0 ^b		0 ^b		0 ^b		0 ^b	
	S ₃	0.001***	1.000	0.002	1.000	0.001	1.000	0.001	1.000
	截距	-2.324*		-1.353		-6.233***		-2.117	

注：将不流转农地作为比较的基准类别；*、**、***分别表示参数在 0.1、0.05、0.01 水平上显著。

3.2.1 自然资本对流转决策的影响

(1) 鄂西圈农地质量比较差和农地质量一般的农户转入农地和不流转农地的概率比分别是农地质量非常好的农户的 0.156 和 0.372 倍，并分别在 0.05 和 0.1 的水平上显著，即农地质量越差，农户越倾向于不流转，这与纪红蕾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原因是质量较差的农地生产收益较低且相对来说较难流转，因此农户更倾向于自己耕种或者请亲戚朋友代耕。两个研究区域的农地质量对农地转出决策均无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在特定的区域中，农地流转租金一般不受个别农地质量的影响而波动。(2) 彭开

丽等^[19]研究认为农户承包地面积越大越倾向于转入农地，本文却发现鄂西圈和江汉平原地区的农户承包地面积分别在 0.001 和 0.1 的置信水平上促进农地转出。分析原因可知，外出打工相较于农业规模化生产回报较快且较易实现，随着承包地面积的增加，转出农地所能获得的租金也就越多，农户基于对家庭现实情况的衡量和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在转入农地和转出农地之间往往倾向于转出农地从事非农工作。(3)鄂西圈农地灌溉条件对农地转出无显著影响，农地灌溉条件比较差的农户转入农地和不流转的概率比是农地灌溉条件非常好的农户的 3.274 倍，且在 0.1 水平上显著，原因可能是鄂西圈地块分散，灌溉条件差的农地较难转出，为了降低单位面积的农地灌溉设施投入，农户倾向于转入农地扩大种植面积；江汉平原地区农地灌溉条件对农地转入转出行为均无显著影响，这是由于江汉平原以灌溉水田为主，农地的总体灌溉条件均比较好且差异较小。

3.2.2 物质资本对流转决策

(1)鄂西圈农户家庭固定资产种类数分别在 0.01 和 0.1 的水平促进农地转入和转出；江汉平原地区农户家庭固定资产种类数在 0.05 的水平上促进农地转入，对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不显著。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存在出入，他们认为固定资产越多，农户越倾向于不流转或转入农地^[22,23]。实地调研中发现，农户固定资产间的差异主要是交通工具的不同，家庭固定资产种类数较多的农户一般外出较方便，对于扩大生产规模和外出务工的选择更加自由，相比较而言，家庭固定资产种类数较少的农户一般不会选择收入较少的不流转农地仅进行农业生产。(2)鄂西圈农户饲养畜禽数量在 0.01 的水平上抑制农地转出，江汉平原地区农户饲养畜禽数量和 0.05 的水平上促进农地转入，后者与纪红蕾等^[10]的研究结果相同，前者则与其相反。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鄂西圈在较难形成规模化农牧业的情况下，农户饲养畜禽数量越多，对农牧业的投入越高，越倾向于不流转以兼业的方式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相应的，江汉平原地区的农户饲养畜禽数量越多，越倾向于转入农地扩大养殖规模。(3)鄂西圈简易结构住房和砖木结构住房的农户转出农地和不流转的概率比分别是混凝土结构住房农户的 0.161 和 0.459 倍，砖木结构住房的农户转入农地和不流转的概率比是混凝土结构住房农户的 0.415 倍，均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江汉平原地区砖木结构住房的农户转出农地和不流转的概率比是混凝土结构住房农户的 0.504 倍，且住房类型对农地转入有抑制性。可以看出农户的住房条件越好，在家里的舒适感和满足感越强，越愿意在本地打工，并且本地务工更容易兼顾农业，因此不流转的可能性就越大。

3.2.3 人力资本对流转决策的影响

(1)鄂西圈农户家庭劳动力占比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江汉平原地区农户家庭劳动力占比在 0.1 的置信水平上促进农地转入，对农地转出有抑制性作用但是影响并不显著。这与郑纪刚^[31]等学者研究成果相似。原因是劳动力多的农户家庭更容易胜任农业生产，因此倾向于转入农地提高农业收入，当家中劳动力较少时，农户则更愿意转出农地获取租金并从事普遍来说收入更高的非农工作。(2)鄂西圈非农劳动力人数在 0.1 的置信水平上抑制农地转入，在 0.01 的置信水平上促进农地转出。类似地，王雪琪等^[12]发现农地规模的扩大需要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即非农劳动力人数越多，农地转入的可能性越小。这是因为鄂西圈交通比较闭塞，非农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家庭较难兼顾外出务工和农业生产，为了避免良田荒废和收益最大化，转出农地往往是优先选择；江汉平原交通较为发达，农户较容易实现兼业生产，所以非农劳动力人数多少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没有显著影响。(3)鄂西圈家庭劳动力最高学历为小学的农户转出农地和不流转的概率之比是家庭劳动力最高学历为大学及以上的农户的 2.221 倍，且在 0.0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反^[10,25]。分析原因可能是过去鄂西圈教育资源较匮乏，拥有高学历成员的家庭整体偏年轻化，更有精力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倾向于不流转，反之，家庭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家庭一般整体年纪较大，更愿意转出农地获得租金贴补家用；江汉平原地区农户家庭最高学历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江汉平原地区一直以来教育资源丰富，样本的差异性不大。

3.2.4 金融资本对流转决策的影响

研究区域内，农户家庭年收入和家庭存款对农地流转决策影响的 OR 值均为 1，即农户家庭收入和家庭存款不影响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农户获得信贷的难易程度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不显著。这与学者们的普遍研究结果不同，分析原因可能是：大部分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较以往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的不同往往不再被自身的经济状况限制，而是基于家庭收

入最大化的最优选择，且据实际调研可知，有实际信贷需求的农户较少，农户对于借贷难易程度的认知对其农地流转决策不会产生直接影响。

3.2.5 社会资本对流转决策的影响

(1) 鄂西圈中认为亲朋邻里一半可信任的农户的农地转出和不流转概率比是认为亲朋邻里全部可信任的农户的 0.456 倍，且在 0.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即对亲朋邻里的信任度越高，越倾向于不流转。这与朱兰兰等^[22]的研究成果不同，他们认为得到较多信任的农户的转入和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比较大。分析本文所得结论的原因，是对亲朋邻里越信任的农户，越有机会也越愿意将农地给他人耕种且鲜有收取费用的，所以转出的概率相对较低。(2) 鄂西圈无政府机关工作的农户家庭农地转入和不流转之比是有政府机关工作的农户家庭的 0.27 倍，且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江汉平原地区家中有人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农户也更倾向于不流转农地，原因是家中有人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农户往往邻里关系较好，会更愿意将耕地给邻里免费耕种，农地转出概率较小。(3) 两地区农户家庭年人情支出对农地转入转出决策均有促进效应，且鄂西圈农户年人情支出对农地转入决策的影响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这与王雨濛等^[30]的研究成果不同，他们认为人情支出对农地转入决策有促进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家庭年人情支出较高的家庭，获得农地流转和外出工作的信息比较容易，不流转的可能性较小。

3.2.6 小结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对江汉平原地区和鄂西圈农户不同生计资本指标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进行了总结(表 7)。

表 7 不同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

类型	指标	研究区域	具体影响
N	N1	江汉平原	无显著影响
		鄂西圈	农地质量越差，农户越倾向于不流转
	N2	江汉平原	促进农地转出
		鄂西圈	促进农地转出
	N3	江汉平原	无显著影响
		鄂西圈	灌溉条件越差，越倾向于农地转入
P	P1	江汉平原	促进农地转入
		鄂西圈	促进农地转入和农地转出
	P2	江汉平原	促进农地转入
		鄂西圈	抑制农地转出
	P3	江汉平原	促进农地不流转
		鄂西圈	促进农地不流转
H	H1	江汉平原	促进农地转入

		鄂西圈	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	
		H2	江汉平原	无显著影响
	H3	鄂西圈	抑制农地转入，促进农地转出	
		江汉平原	无显著影响	
	F	F1	江汉平原	无影响
			鄂西圈	无影响
F2		江汉平原	无影响	
		鄂西圈	无影响	
F3		江汉平原	无影响	
		鄂西圈	无影响	
S	S1	江汉平原	无显著影响	
		鄂西圈	促进农地不流转	
	S2	江汉平原	促进农地不流转	
		鄂西圈	促进农地不流转	
	S3	江汉平原	促进农地转入和农地转出	
		鄂西圈	促进农地转入和农地转出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文章基于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决策影响的理论基础，建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测算模型，通过多项 Logisitc 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异质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

(1) 江汉平原地区的农户社会资本水平低于鄂西圈，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水平均高于鄂西圈。因此，地形平坦、土地肥沃、经济发达且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江汉平原适合发展大规模农业，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相应地，鄂西圈适合推广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从而降低耕地撂荒率、减少劳动力就业问题。

(2) 农户的金融资本不影响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具有多样性，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鄂西圈农户的农地质量、承包地面积、固定资产种类数、家庭劳动力占比、非农劳动力人数、家庭年人情支出对农地转入或转出有正向影响，农地灌溉条件和家庭劳动力最高学历对农地转入或转出有负向影响；同时，江汉平原地区农户的承包地面积、固定资产种类数、饲养畜禽数量和家庭年人情支出对农地转入或转出均有正向影响。因

此，应当制定差别化的农地流转促进政策。

4.2 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江汉平原和鄂西圈地区生计资本水平具有较大差异，但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因此可从区域影响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出发分别提出促进农地流转的优化政策。

从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决策影响的区域一致性来看，应从保护耕地资源、提高劳动力水平方面促进江汉平原和鄂西圈地区农户转出行为选择和扩大农地转出规模：(1)应做好农地保护工作，提高农户自然资本水平。应加强对农地的宏观管理，对农地利用做好规划和监管，严格控制土地“农转非”利用；引进先进技术，对农田水分状况进行监测，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农地的灌溉水平；从数量、质量上尽最大可能地保护农地尤其是耕地，满足百姓的生活需求和农地需求，实现农地的可持续利用。(2)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农户劳动力资本水平。落实农村基础教育，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教育投入力度，加速农村人才培养，提升村民的文化素质。普及农技知识，将农业科技与经营管理知识相结合，培育新型高素质农民。加强农业和非农技术培训，搭建职业农民培训体系，形成现代农业发展格局。继续支持农村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发展，提升大学生家乡就业的环境和待遇，减少人才流出和乡村“空心化”。

从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决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来看：(1)江汉平原地区应继续提高有农地转入意愿农户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水平，为其转入农地提供更高的物质和经济保障。具体而言，可通过对牲畜饲养点进行统一的规划，安排专业人员指导村民进行科学喂养，降低牲畜患病和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以适当的经济补助降低牲畜饲养的风险，提高农户转入农地扩大养殖规模的积极性；其次，可降低贷款条件，提高农村金融对农业生产活动的支持力度和服务水平，解决农户资金瓶颈，提高江汉平原地区农户的金融资本水平。(2)鄂西圈还应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发展经济、提升农户的社会资本，促进农地转入的发生率。具体而言，可通过提高山区基础设施建设补助标准，完善道路设施建设，做好公交车、大巴车等公共交通路线规划，为农业机械上山创造可能，降低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力成本，减少基础设施建设对山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其次，可通过定期组织集体活动，为村内的留守老人和儿童建设休闲文化场所，组织村干部在节假日进行看望和慰问，提升老人和孩子对村民的信任度，宣传集体互助精神，促进村民与亲朋好友的友好往来，提升村民社会资本；最后，应大力发展地区经济，提升农户的金融资本水平。鄂西圈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三峡大坝、武当山、神农架等均是充分利用以发展旅游业的生态文化资源，旅游业的发展的良好态势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从而提升农户的金融资本水平。

参考文献:

- [1]黄季焜, 冀县卿. 农地使用权确权与农户对农地的长期投资[J]. 管理世界, 2012(9):76-81, 99, 187-188.
- [2]梁流涛, 许立民. 生计资本与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3):63-69.
- [3]BOGAERTS T, WILLIAMSON I P, FENDEL E M. The role of l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accession of central European countries to the European Union[J]. Land Use Policy, 2002, 19(1):29-46.
- [4]VAN DIJK T, Scenarios of central european and fragmentation[J]. Land Use Policy, 2003, 20(20):149-155.
- [5]GORTON M. Agricultural land reform in Moldova[J]. Land Use Policy, 2001, 18(3):269-279.
- [6]丰雷, 李怡忻, 蒋妍, 等. 土地证书、异质性与农地流转——基于2018年“千人百村”调查的实证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21, 18(1):151-164, 176.

-
- [7]高佳, 宋戈. 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对农地流转的影响[J]. 经济地理, 2020, 40(8):172-178.
- [8]吴巍, 张安录.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4市625份农户调查[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4):107-113, 131-132.
- [9]阳利永, 吴利, 杨艳俊. 地域分异与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4):187-195.
- [10]纪红蕾, 蔡银莺. 生计资本异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武汉城市郊区的516户农民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7, 26(2):220-226.
- [11]陈曼, 甘臣林, 梅昀, 等. 农户生计视角下农地流转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基于武汉城市圈典型农户调查[J]. 资源科学, 2019, 41(8):1551-1562.
- [12]王雪琪, 朱高立, 邹伟. 农户生计资本、家庭要素流动与农地流转参与[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1, 30(4):992-1002.
- [13]CHAMBERS R, 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R].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2.
- [14]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R]. London: DFID, 1999.
- [15]LASSE K.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to poverty reduction[R]. Sweden: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01.
- [16]SCOOONES I.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R].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
- [17]李荣彬. 生计资本视角下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16, 22(6):47-54, 64.
- [18]孙学涛. 促进还是抑制?——非农就业对农地效率的影响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1, 42(1):133-144.
- [19]彭开丽, 程贺.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132-142, 174-175.
- [20]韩旭东, 王若男, 杨慧莲, 等. 土地细碎化、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基于全国2745个农户调研样本的实证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5):143-153.
- [21]葛玉娟, 赵宇鸾, 李秀彬. 山区耕地细碎化对土地利用集约度影响——以贵州省亚鱼村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7):1095-1105.
- [22]朱兰兰, 蔡银莺. 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16, 31(9):1526-1539.

-
- [23]李朝柱,石道金,文洪星.关系网络对土地流转行为及租金的影响——基于强、弱关系网络视角的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0(7):106-116.
- [24]赵微,张宁宁.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5):157-164.
- [25]万晶晶,钟涨宝.非农就业、农业生产服务外包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29(10):2307-2322.
- [26]朱农.论收入差距对中国乡城迁移决策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02(5):10-17.
- [27]沈萌,甘臣林,陈银蓉,等.基于DTPB理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9,40(3):441-449.
- [28]徐章星,张兵,刘丹.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6):134-147.
- [29]杨晶,邓大松,申云,等.社会资本、农地流转与农户消费扩张[J].南方经济,2020(8):65-81.
- [30]王雨濛,张效榕,张清勇.社会关系网络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吗?——基于河北、安徽和山东三省的调查[J].中国土地科学,2018,32(1):51-57.
- [31]郑纪刚,张日新,曾昉.农地流转对化肥投入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J].资源科学,2021,43(5):921-931.
- [32]段伟,任艳梅,冯冀,等.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自然资源依赖研究——以湖北省保护区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5,36(8):74-82,112.